



《林海雪原》—— 讲述革命传奇 唱响英雄颂歌

□姚 丹

1957年，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出版，随即引起轰动。不到一年时间，重印6次，累计印数近百万。小说后来被改编为话剧、戏曲、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传播广泛，成为几代人的红色记忆。“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扑上前。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换人间。”根据小说改编的革命现代戏《智取威虎山》至今仍活跃在文艺舞台上，其中诸多唱段广为传唱，小说还被改编成电影，轰动全国。在海外留学的青年徐克看到影片后被深深吸引，数十年后，他导演的3D电影《智取威虎山》累计票房破8亿，再次印证红色经典独特且持久的魅力。

用文字建起一座“英雄丰碑”

1945年底，东北牡丹江地区局势危急。惯匪盗寇、地痞流氓、土豪恶霸等狼狈为奸，从日本侵略者手里获得大量精良武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作家曲波当时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牡丹江军区二支队二团，加入到剿匪战斗中。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就是曲波根据自己的这段亲身经历写成的。

1955年春节前夕的一天，已从部队转业曲波夜里冒着大雪回家，看到幸福酣睡的妻女，一股热流涌上心头。他想起了8年前的大年夜，自己和杨子荣、高波等战友以少胜多地打下了艰难的一战。杨子荣、高波牺牲了，他们未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未能过上温饱舒适的生活。想到这里，曲波的心中有

了一丝愧疚，但更多的是对战友深深的怀念。曲波坚定了写作的决心：要用文字建起一座“英雄丰碑”。

曲波文化程度不高，对他来说，写一部长篇小说的难度可想而知。他一直用杨子荣的一句话“为人民事业生死不怕，对付敌人一定神通广大”激励自己。利用夜晚和节假日的业余时间，曲波终于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了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荡匪记》，出版前改名为《林海雪原》。小说主要描写了一支30多人的小分队如何穿林海、过雪原，与人数数十倍于自己的匪徒周旋作战，最终经过惊险的战斗，将敌人全部歼灭的故事。

善用鲜活语言塑造人物

在《林海雪原》的战斗故事中，尤以“智取威虎山”最为精彩，广为人知。杨子荣抓获土匪座山雕的真实故事，刊登在1947年2月19日的《东北日报》上。从报道看，这场战斗规模不大，我军只有6名战斗人员，却活捉了包括座山雕在内的25名敌匪，摧毁敌匪窝棚，“缴获步枪六支，子弹六百四十发，粮食千余斤”。在曲波笔下，这场惊险的战斗演绎出打虎、对黑口、献先遣图、舌战小炉匠等精彩惊险的情节，《林海雪原》进而成为革命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

红色经典《林海雪原》让杨子荣、少剑波等英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杨子荣勇猛机智，不畏牺牲；年轻的团参谋长少剑波足智多谋、指挥若定。这一“武”一“文”的形象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了一曲激越昂扬的英雄颂歌。

《林海雪原》的文本结构、叙述方式、人物设计等，与中国传统传奇文学有颇多相似之处。比如小说中最重要的5位革命战士少剑波、杨子荣、刘勋苍、栾超家、孙达得人物组合，既为读者带来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也让人们倍感亲切。与此同

时，小说虚构了“白茹”这一美好纯洁的女战士形象。“她是雪原的白衣士，她是军中的一朵花。她是山峦丛丛的一只和平鸟，她是林海茫茫的一个‘小美侠’。”白茹就像一缕阳光，照进阴风飒飒、刮肉透骨的鹰嘴山，为充斥着血与火的残酷战争带来一抹柔情。

语言的巧妙使用，为《林海雪原》故事情节的推进和人物塑造增色许多。“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啦？防冷涂的蜡”，这些读起来朗朗上口的对白广为传播，老少皆知。现实生活中，像座山雕这样的土匪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平时的暗语都是最普通的白话，小说中这些流传甚广的“行话”其实是曲波的艺术加工。

生动鲜活、充满民间智慧的语言，在《林海雪原》中还有许多，无不得益于曲波“讲故事”的天分。曲波在成为作家之前，能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像说评书一样讲出来，其中最精彩的章节甚至能背下来。当曲波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担任某厂党委书记时，他也经常创造机会，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的故事，鼓舞人们努力奋斗。可以说，“讲故事”的经历给曲波提供了宝贵经验，让他在写作时具有读者意识，善于用鲜活生动的语言塑造人物。

“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

1999年，我前往北京百万庄大街的一处住宅，对曲波进行前后两次近6小时的录音采访，了解到许多历史细节和写作细节。

曲波曾在东北战斗中两次受重伤。在辽沈战役期间，他的股动脉受伤，炮弹片打进右腿关节。爱人刘波经过多方打探找到曲波时，他正躺在一扇门板上，头发很长，发着高烧，脸色苍白。这次受伤给曲波留下终身残疾，右腿比左腿短了4厘米。当

曲波和我讲述这段惊心动魄的生死往事时，并没有很在意。当他提起杨子荣、高波等牺牲的昔日战友时，则时时哽咽，不得不停下了下来，房间里只有录音磁带沙沙转动的声音。

曲波回忆，杨子荣每次侦察带回来的情报都特别准确，按照这些情报安排军事行动，基本不会有差错。然而在一次剿匪行动中，杨子荣不幸牺牲。1947年3月，杨子荣带着3位侦察员追捕土匪郑三炮。凌晨时分，经过一夜的埋伏等待，杨子荣一马当先冲进匪徒的窝棚，与匪徒正面交战，未料到由于夜里气温低，枪栓被冻住，杨子荣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

事后，当人们整理杨子荣遗物时，发现小小的包裹里只有麻绳、锥子、旧鞋帮子和废鞋底子。杨子荣抓敌无数，过手了大量金银首饰、大洋烟土，但从从不藏为己有。包裹里的这些绳锥碎布，是他每天给战士们补鞋的必备用品——这就是曲波深深怀念、不能忘怀的“勇猛之极，坚贞之极，心灵纯良之极”的战友。得知杨子荣牺牲的消息后，曲波病了3个月。

在创作《林海雪原》的过程中，曲波数次因为情绪激动而辍笔。一天夜里，曲波写到小说结尾部分。就在描写杨子荣倒下的一瞬间，曲波泣不成声，笔再也落不下去。停了很久，想了很久，最后他大笔一挥，自言自语道：“不，杨子荣同志不死！”于是，小说中的英雄杨子荣没有倒下，而是和大家一起继续追击敌人。

在与曲波的交往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对个人利益看得很轻，但对群众利益抱有无限的热忱。我第一次拜访就被他家的朴实无华所震动。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曲波仅稿费收入就超过万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全部捐了出去。

共产党人“漫天风雪寻常事，破荒闯阵荣春华”的传奇，在曲波笔下生根发芽，也成为作家本人生命的一部分。曲波在写作《林海雪原》时，仿佛在诉说自己的故事，自然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准确把握，贴切描摹，那生动的形象、引人入胜的情节，也深深地打动了一代代读者。杨子荣、高波等战斗英雄牺牲了，但共产党员胸怀理想、无私无畏的精神流传至今，这也正是《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的精神价值之所在。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重读红色经典



你就要来了 我知道
只是 不知道你这么暴力
先是冰雹
然后冰雨“白色恐怖”
一夜之间 封门 封路 封城
一觉醒来 所有的秩序 都被打乱

有的农贸市场坍塌
轻轨趴窝 学校停课
哪来的这么多雪呀 这天上
50多个小时的强降雪
却心生温暖
一把把挥舞的扫帚
扫出一片蓝天
一辆辆轰鸣的铲雪车

铲出一方平安
一个个坚守的身影
大写一种力量叫磅礴

但 雪后的美 很治愈
太阳亲吻过的六瓣花
是不一样的烟火
山峦 围一条洁白的哈达
江河 戴一枚枚巨无霸的口罩

轻摇轻简 双手合十
不求 下一场诗意的雪
不妥 下一季盎然的春
抗击疫情 祝每颗心都芬芳
人间陡峭 愿每一天都幸福

定格在心中的面容

□徐廷华

情感氧吧

母亲离开我们5年多了，前几天，我们兄妹仨早早来到墓地看望她，这是她抚育的3个最亲的人。

2015年8月18日凌晨，还在睡梦中的我，猛地听到电话铃响，声音在寂静的午夜是那么的急促，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妹在电话中呜咽地告诉我：“妈妈走了。”

母亲是因高血压中风摔倒骨折，在她3尺病床的空间里抗争了一年多，带着她深深的遗憾离开了无限眷恋的亲人。她除了思维还是那么清晰外，其他都无能为力了。我们兄妹仨精心地照料着母亲的起居，上午将病床摇高，让她看戏视频道播出的越剧节目；午饭后将病床降下来，让母亲睡个午觉；替母亲洗头时，将空气床垫移到床外，椅子上放好温温的水，一个人托着母亲的肩膀，一个人给母亲洗头，另一个人来回地换水。更多的时候，我们逗她开心，和她讲过去的往事，陪伴着母亲度过寂寞的时光。

10个小时前，我还和母亲微笑着挥手再见，说好的明天买水蜜桃给她吃，没想到母亲就这样走了。

母亲平静地躺在床上，眼睛还睁着，她不舍晚年给她温暖的这个和睦家庭。我轻轻地抚平母亲黑乌乌的头发，抚摸着母亲还有点弹性的脸，抹闭上了她还想看一看儿女的双眼，亲吻着她那还带有余温的苍老的手。母亲操劳了一生的手臂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沉重。70岁的我，终于抑制不住了，一滴滴豆大的泪珠滚落在母亲的身上。这一年母亲虚岁89。

我常去母亲那儿看望，退休后看母亲的次数更多了，每次去时，事先会在电话里约好。母亲把我去看她当成生活中的“重大节日”，早早地就拄着拐杖下楼在小区门口等我。每次去，我都会给母亲带上一两点她喜欢吃的东西，且拣最好、最贵的买；猕猴桃是论个买；红枣买新疆大枣；香蕉买进口的；苹果是挑个大且绵软、没牙齿也能咬动的那种。

我和母亲常在桥边散步，春天垂柳依依，夏日凉风习习，秋天满地金黄，冬日白雪皑皑，母亲说这里风景好，养人。有时，母亲会挽着我的手，摇晃着，那是她最高兴的时候。碰到熟人，母亲会和她们说：“这是我的大儿子。”语气中有一种自豪。

走累了，母亲就和我坐在河边的靠背椅上，这时她会从手提袋里拿出一些零食，边吃边聊家常。在母亲眼里，我永远是个孩子。她会操着浓浓的宁波乡音跟我说：“依啦勿要老买嘜（这么）贵的袜子（东西）给我，依己个（自己）勿索（舍）得确（吃），好袜子都给阿姆（妈）吃了。依阿妹条件好，吃点无所谓。老这样阿姆心里勿过意哦。”我望着母亲脸上溢满了笑，那笑里又有一种无以言说的心痛和对儿子的怜爱。

每次和母亲分别，老家人都要送我一程，不难看出她那依依不舍的心情。走了好长好长一段路了，那“笃笃笃”拐杖敲地的声音让我忍不住，我几次拦住母亲，她总是欲停又走。于是我会转身，再和母亲走回去。

当我跨上自行车时，老远还听到母亲的叮嘱声：“埋埋（慢慢）骑哦，路上当心点。”母亲一直要望着我骑得老远老远，消失在她的视野中。我回头看她时，灿灿的夕阳下，母亲一只手指搭在额头上，还在望着我，我挥舞着一只手，直到母亲的身影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

如今，我再也看不到母亲了，我失去的是活生生的妈妈。母亲亲切的面容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直到我生命的尽头。



冬暖翠湖 人鸥同乐 新华社记者王冠森摄

佳作浅评

“单筒望远镜”这个诞生于17世纪初荷兰的物件，当下的人们见得不多，实际使用者就更少了。对它的认识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来自观影时留下的印象：一个洋老头或洋老太端着一个单筒望远镜眯着一只眼正在窥探着什么。就是这么一个镜头、这样一个物件立马将我们的想象带入了100多年前的那个世界，记住了那么一副表情：一种单向的联系，一副窥探的状态。这是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意象，冯骥才的长篇小说新作《单筒望远镜》的故事就是由此而展开。

当然，大冯在他的新作中所呈现出的意象并不止单筒望远镜这一个。比如还有那“一棵奇大无比的老槐树，浓郁又密实的树冠好比一把撑开的巨伞”；还有那座白色的空荡荡的小洋楼顶边上的那间“小小的六边形的阁楼”“阁楼东西两面墙上各有一个窄长的窗洞”“面对着的竟然是两个全然不同的风景——一边是洋人的租界，一边是天津的老城”。

就这样，一副单筒望远镜，一棵老槐树，一幢小洋楼的两扇窗，3个意象，共同构成了大冯这部《单筒望远镜》中3个基本的、清晰的物理指向——时间：上世纪初；地点：天津卫；事件：中西冲突。那副来自100多年前的西洋单筒望远镜被一位法国军官漂洋过海地带到了天津的租界里，他的女儿莎娜又将其神奇地分享给了一家洋门纸店的二少爷欧阳觉，一出跨文化的浪漫情缘由此上演，而这样一段浪漫传奇瞬间又在殖民时代加上中西文化充满隔膜的背景下迅速地被裹挟进了战火的硝烟，一场悲剧令人唏嘘不已。

尽管大冯中断长篇小说写作已有多年，但他的创作并不是第一次触及上世纪的津门及中西碰撞的内容。早在这部《单筒望远镜》问世前的40年，大冯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自己的长篇处女作《义和拳》。这位伴随着新时期一同成长的著名作家固然以《铺花的歧路》《雕花烟斗》等名篇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而成名，但他和那一茬“伤痕文学”作家相比始终又保持着自己鲜明的创作烙印，那就是在关注现实、反思社会问题之外，还有《神灯前传》《神鞭》《三寸金莲》和《阴阳八卦》等另一类文化历史小说同样引文坛注目。然而，当大冯的小说创作势头正旺之际，这个大个子竟毅然决然地终

止了自己的小说写作，用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跑去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这段历史在他2018年面世的纪实之作《旋涡中》有着翔实的记载。对此，大冯说：“20年来，文化遗产抢救虽然终止了我的文学创作，但反过来对于我却也是一种无形的积淀与充实。虚构的人物一直在我心里成长；再有便是对历史的思考、对文化的认知，还有来自生活岁久年长的积累。因此现在写起来很有底气。”

由此看来，这部《单筒望远镜》就是大冯底气十足创作出的一部新作。

《单筒望远镜》整体篇幅虽不足15万字，却文化化地浓缩记录了那段屈辱的历史以及反思那段历史之成因，这份沉甸甸的厚重已远远超出了区区15万字之轻。

选择19世纪的天津作为《单筒望远镜》故事展开的场景，是因为那里正是东西方在中国疆域内最早发生冲突的地方之一。随着1862年天津地方上英法租界的设立，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接触与交流越来越多。此时的天津颇有其两面性：作为一座先发的商业都市洋气的一面不难想象，而作为一

看过去及未来

——读冯骥才长篇小说新作《单筒望远镜》

□潘凯雄

个码头的天津则或许更为国人所熟悉，充满了区域市井的特点。于是，五方杂处，一洋一土、一中一西，彼此的怀疑与排斥，相互的猜忌与提防，日积月累，悲剧不可避免地上演了。

当然，如果沿着《单筒望远镜》的场景再往前溯，早在庚子前40年前悲剧就已开始：英法联军在征服了这座城池后，一路朝西北方向打进了北京火烧了圆明园……到了庚子这一年，还是在天津的地面上，从租界的对峙发展到洋人的屠城，血光冲天、遍地哀鸿……国已然如此，家庭、个体又能怎样？位于府署街欧阳老爷家那棵五百年的老槐树在这场战火中轰然倒塌，巨大的身躯重重地压在它身下边的老屋上，欧阳老爷葬身于坍塌的屋子里；而二少爷欧阳觉和单筒望远镜主人的女儿萨娜，这对中西青年的浪漫情缘同样被这场冲突给生生搅得阴阳分离，在租界与老城的对峙中，因为爱，他们首先想到的都是对方，都要到对方的地界去，结果酿出的只能是更惨的悲剧。

悲剧酿成的根源，从政治学角度的解读自然就在于西方列

强的殖民和霸凌，以及清廷的闭关锁国与夜郎自大；而从文化学分析则是所谓文明的冲突。从单一角度看自是各有其理，但实际上必然是一种综合原因之使然。当然在多重因素中毕竟还是有其主要矛盾的存在，学术研究固然可以侧重于某一角度，文学创作也是一样。但《单筒望远镜》带给我们的启迪却并不如此单一。

谈《单筒望远镜》首先产生的一个强烈震撼就是再次想起了那句大白话：落后就要挨打！在大冯笔下，这样的场景实在令人惨不忍睹：冲突的双方：一方有单筒望远镜、有洋枪洋炮；另一方还以以贴着纸符就可以刀枪不入。于是这群头扎蓝巾、手持刀棒的勇士们无论训练如何有素、咒语念得如何嘹亮，在洋人的荷枪实弹面前，只能是一排排地沦为灰烬。这就是硬实力的差异，而当这种差异一旦处于绝对悬殊的状态，其它似乎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单筒望远镜》带给我们的启迪如果仅限于对硬实力的这种比较，则不免有望望远镜虽老，作品却大失价值之憾。在《单筒望远镜》的封底，大冯有如下自述：“在中西最初接触之时，彼此文化的陌生、误读、猜疑、隔阂乃至冲突都在所难免；而在殖民时代，曾恶性地夸张了它，甚至将其化为悲剧。历史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把它拿出来重新洞悉一番，从中获得一点未来所需的文明的启示。”应该说，这才是《单筒望远镜》的独特价值之所在。作品的表层固然是透过欧阳老爷一家的命运特别是其二公子欧阳觉与洋女子萨娜

的爱情悲剧呈现出庚子惨案之惨，但骨子里则意在“把它拿出来重新洞悉一番，从中获得一点未来所需的文明的启示。”如前所言，庚子惨案之根当然是因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和霸凌以及清廷的闭关锁国与夜郎自大，但百年之后回过头来看：那种“文化的陌生、误读、猜疑、隔阂”在这个过程中是否也在起着推波助澜而非润滑消解的作用？历史与现实中这样的例证确实不胜其多，于是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才得以大行其市。姑且不论“文明的冲突”是否具有必然性，但与此同时，“和而不同”的学说以及异质文明和谐相处的案例同样比比皆是，而其中的秘诀则在于包容、交流与融合。而这一点当下极具现实意义。在这样一个高度全球化多极化的新时代，如何处理好异质文明的和谐共处，对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至关重要。

透过“单筒望远镜”，我们不仅回望了过去，更思考着未来，这才是大冯这部作品的价值及意义之所在吧。